

理性生活方式的重建： 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研究

张向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理性生活方式的重建： 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研究

张向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生活方式的重建: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研究/张向东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004-6359-7

I. 理… II. 张… III. 哈贝马斯, J. —政治哲学—研究
IV. B516.6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9734 号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张向东，男，河南光山人，1972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主攻方向：政治哲学、现代化理论，现在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工作，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生导师。

Abstract

What's the basis of good life ? This is human's fundamental issue that political philosophy focuses on and also shows ultimate concern for human's existence. Moreover, in different times, it appears with different forms. Hence, this issue is identical between the two— the times and human's fundamentality.

Habermas '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how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uman's historical existence and what's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uth in current times. Therefore, "What's the basis of good life ?" is embodied in the issue "how to integrate the values with diversities" . With the breaking up of rationality, its diversities in practice standards have sprung up in real life, and the incompatible conflicts are presented before the world as well, which is how rationality itself realizes its discourse. Just as Habermas puts forward, realizing the identical of life can be built up on the basis of rationality. Naturally, the integration of this kind is no more based on the acknowledged rationality to principal philosophy, but enables rationality to come back to practice again and renew its implication in practice, namely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by Habermas' .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makes break-up truth standards inte-

grated efficiently in dialogue structure. Communication consensus reached through dialogue is definitely the integrated truth efficiency. The efficiency of this kind constitutes the practice regulations for human's co-existence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Therefore, so far as Habermas'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concerned, the rules in the essence of life with high qualities is rationality/to live rationally, namely on the basis of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truth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the identical of life rebuilt correspondingly, which is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s life.

Because morality and politics are included in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s practice, Habermas' study is certainly transferred to the two fields after he has constructed his own theory in terms of primitive theory. Thus, Habermas' political philosophy consists of primitive theory, morality theory, and politics theory. Through them is permeated the way how the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is combined with truth in practice, and how the practical life should be rebuilt to seek the truth in human's activities. He has renewed the publicity and value factors of classical politics, criticized the excessive technology controlling in modern politics, and especially opposed to the technology politics as a token of controlling. So, for Habermas' part, politics and morality have become significant fields for human's co-existence.

Moral consensus formed in public fields is the basis of political legality; the law formulated in political fields is the embodiment of truth. When people take truth as their act rules, or truth understandings as co-existence aim, human's existence value also gets embodied. As a result, as Habermas thinks, politics is becoming the highest significance fields for human's living. Its concrete form for realizing it is

the world government as a cor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Key words: Habermas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rational life
discourse principle

序

本著作是张向东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它的问题意识来自于二战后尤其是在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一系列重大的现实和理论背景，成像于当代西方思想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审视、反思、重建的诸多争论，并从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在当代语境下好的生活何以可能？如何反思和承接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成果？）出发，系统澄清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路。

我们首先需要简单勾勒了解当代西方尤其是欧洲社会面临的系列难题。对于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欧洲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危机，我们大多耳熟能详。二战结束后，欧洲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地盘，一分为二的欧洲在冷战意识形态的阴影笼罩中进入竞争性抗衡的重建时期，“欧洲中心论”因美苏二元的对立而终结；在 60 年代后，欧洲国家虽然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相继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但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一直要求恢复欧洲思想的自主性，并努力对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以及近代以来所留下的文化知识遗产进行重新评价，从而首先在法国掀起了一股反主流文化的激进政治热潮，反叛的运动和思想在现实与文化领域也风起云涌，标志性事件为 1968 年的“五月风暴”。随后，七八十年代民族国家功能萎缩，末期出现苏东剧变；90 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加剧和风险意识的增强。这些始料未及的

危机对启蒙思想所形成的认识论、价值观、世界观,以及由此生长的西方所有思维模式、制度体系和行为方式都产生结构性的冲击,甚至对自古希腊时代之后的整个西方理性传统都构成巨大挑战。

从理论上如何看待各种涌现的社会政治现象?在当代语境下如何对待西方理性传统?在这个反思一切甚至怀疑一起的时代如何使人们继续追求幸福生活?这些是亟待知识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当代知识界反响最强烈的可能是,法国米歇尔·福柯所引发的一场跨世纪的学术论战:即,我们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或者还仍然停留在现代性之中?现代理论是否有能力解决当前时代的问题?这些问题经过思想家针锋相对的争论,最后搭建起一个理论交战的平台,即现代性主题,简言之,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战。所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从不同理论和方法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以及为人类未来所提供的出路,都全部放在这个具有历史纵深和世界空间的知识平台上接受拷问、诠释和再整理。在这一场学术论战中,哈贝马斯彰显其惊世价值,他所建构的理论体系最能接受挑战,而且敢于挑战其他所有异己的话语体系,尤其是对后现代支持者的挑战,从而成为对当代知识界最有贡献和最有影响力的旷世奇才。

作为扛起后现代思潮大旗的福柯,深受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和尼采权力意志学说的影响,继承了反启蒙的传统,批判现代性和人本主义,宣告“人已死亡”,并发展了一种关于社会、知识、话语、权力和伦理学的新观点。这成为此后其他后现代思想的主要资源库之一。福柯运用他称之为“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新史学研究方法,采取一种“由下至上”的微观分析方法,通过考察精神病学、医学、惩罚与犯罪学以及各种规训机构的形成过程,论证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压制了社会和政治领域原

本的差异性、多元性和个体性。^① 对于当今社会是否出现历史断裂的问题，福柯采用了一种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法——历史断裂总是包含着新旧时代间的交叠、互动和回应，强调历史的断裂只是为了对抗那种宣扬历史进步和连续性的传统理论的霸权。^② 而且他还从伦理学领域对西方历史的断裂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以此来表明，在道德方面古典时期与中世纪的历史断裂远大于中世纪与现代的断裂。福柯的著作几乎对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仅从政治学而言，他的考察视角为我们解释了现代社会的理性、知识和规范的结合以及权力的普遍存在，开创了微观政治学的先河，助长了 80 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对政治伦理学的研究热潮。但正如凯尔纳所总结的那样，福柯虽然开辟了重新思考权力运作和政治策略的空间，但没有为此提供任何积极内容，很少涉及国家和资本等宏观权力的重要作用，并且对宏观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忽视还影响了其他后现代理论的关注点。^③

相比之下，利奥塔则倾向于与现代理论和现代方法的决裂，在哲学、伦理、政治和美学等领域积极推广他的后现代观点。但他不是从批判现代的社会经济现象或分析后现代的社会文化形式出发，而是着重比较传统哲学及传统社会理论的宏大叙事与其认为更可取的后现代知识状况之间的差异。^④ 由于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只是一种与现代知识决裂的话语，而且太过于片面、抽象和

① 可参阅福柯《规训与惩罚》和《疯癫与文明》，均为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②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7—58 页。

③ 同上书，第 89—92 页。

④ 参见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 年版。

独断,远离了具体的社会政治批判和分析,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难以发展成一种分析现代社会、阐释后现代社会的新视角和新理论。

鲍德里亚是七八十年代立场最鲜明也是思想最极端的后现代性理论家。他的理论深刻影响了社会、政治、哲学和文化理论等领域,开创了有关当代媒体和艺术的话语。鲍德里亚早期的分析对象是消费社会、媒体与信息、现代艺术、当代时尚等问题,并以此确立其现代性理论。他展开的研究路径是,区分由符号交换建构起来的前现代社会与由生产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并由此来支撑他关于历史新断裂的主张。认为,由生产、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所支配的现代性纪元已终结,而一种由新技术、文化和社会形式所构成的后现代性纪元已降临,并坚持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存在相当明确的分界线。鲍德里亚宣称,在后现代性社会里,符号本身拥有了生命。他因此强调生产社会回归到符号社会,并建构出一种由模型和符号组成的新社会秩序。^①鲍德里亚批评福柯的微观分析还不够彻底,认为他没有探讨消费、休闲和符号等当代权力与社会再生产的关键机制,主张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与后现代的诱惑关系之间的完全对立。^②这种最激进的后现代思想为我们研究西方消费社会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但它并没有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断裂做出描述和理论证明,只是在抽象层面提出一些片断性的观点,而且他的分析也无法结合和透视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变迁的真实现象。所以,这种思想放弃了社会现实的批判追求,超越了一切政治倾向、立场和认

① 参阅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参阅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同，最终只能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①

福柯、利奥塔和鲍德里亚等后现代理论家从不同视角断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出现某种历史性的断裂，而这种论断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反而遭到许多批判理论家的坚决拒斥。以哈贝马斯最为典型，自从他在80年代开始介入与后现代的论战以来，就一直坚守现代性，并视之为一项许多解放潜能尚未实现的未竟事业，认为，所有反启蒙的思想在理论和政治上都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②。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来剖析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早期到晚期的转变。这一方面不仅捍卫现代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批判现代性的压迫性和破坏性；另一方面又试图运用交往行为理论来寻求启蒙理性的重建。认为社会的进步可以通过交往来实现，只要人们愿意对争议性话题展开理性的讨论，愿意让所有人都拥有自由平等参与讨论的权利，愿意向更好的论据妥协而接受理性的共识。^③并由此断言没必要摒弃现代性的连续性而宣扬后现代。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捍卫现代民主、伦理和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启蒙和理性提供了一份进步和倒退的悖论性遗产：民主、自由和批判理性等都是进步的，而工具理性向所有生活领域的扩张则是破坏性的。他认为，后现代追随者们忽视了这种客观辩证性，而仅仅把现代性等同于工具理性并加以剔除。哈贝马斯指出，福柯等后现代理论家只会导致非理性主义，因为他们都没

①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179—186页。

② 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七、九章，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③ 尤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导论部分。

有为有效的社会批判和现实政治的改造提供规范、基础和立足点。^①

我们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全部著作都是考察现代性的起源、轨迹和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积极反思它在当今社会所遭遇到的困境、症结,并试图在保留成果的基础上寻求修正启蒙理性的方案,同时,在哲学领域、社会理论、文化批判和政治追求等方面的研究都一致强调现代性的连续性。他也明确表示,试图提高维护现代性的力度就是为了对抗后现代性思潮的趋势,因为“各种后现代性的观点,再加上前现代性的影响,已经在一些新兴文化中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②。

哈贝马斯的理论进入我国,首先是作为西方哲学前沿的最新发展来翻译的。它真正作为影响我国知识界并成为在汉语界中对现代性反思的理论资源,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当时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哈贝马斯的人权理论和文化民主成为自由主义者的理论支撑点。^③他们认为,在作为底线的人权为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基础,交往商谈的原则则为多元文化达成共识带来新的希望。当时的现实是,在政府权威推动下的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急剧的变化,虽然社会中出现了多元利益并存的格局,但这种多元分化却是一种断裂式的存在,利益的分层无法实现利益的共识。面对这种困境,许多学者力图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商谈原则的范式来建构我国政治的公共性平台。商谈式的文化民主作为乌托邦的构想,无疑对现实

① 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七、九章,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② Jürgen Habermas (1981),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22, p. 13.

③ 参见 <http://www.tecn.cn> 中相关主题的争论。

具有深刻的批判和反思意义，但是当它一旦转化成为现实操作层面的原则和规范时，却又显得天真和不切实际。因为，在市场高速发展，利益至上的价值冲击下，人性幽暗面，以及以这种幽暗面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正是构成多元利益无法实现共识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商谈原则所遵循的道德前提，在断裂的多元化现实中是非常的脆弱和无力。因此，哈贝马斯的理论在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在汉语界对现代性的反思中，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或何种程度上具有支撑性的基础地位，还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张向东博士关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的结构性研究，无疑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它的存在价值。

孙关宏

2007年4月20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	(1)
导论	(1)
第一节 哈贝马斯的思想历程	(1)
一 现实的反思	(2)
二 问题的提出以及早期的理论探索(50—60 年代)	(5)
三 交往行动理论的形成(70—80 年代中期)	(11)
四 普遍主义的伦理和政治——理论的应用(80 年代 后期至今)	(14)
第二节 对哈贝马斯的研究现状及评价	(19)
一 对哈贝马斯理论体系进行评价性的介绍	(20)
二 对哈贝马斯的批判	(21)
三 对哈贝马斯与其他理论之间关系的评价	(24)
四 我国的哈贝马斯研究状况	(26)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27)
一 问题的提出	(27)
二 理论建构的逻辑	(32)

第一章 交往理性与生活方式的同一性	(37)
第一节 交往行动理论建构的背景	(38)
一 理性分化的困境	(38)
二 历史和语言——解释学的探索	(42)
第二节 交往行动理论的建构	(47)
一 深层解释学与自我的本体建构	(47)
二 个体,作为“类”存在的规定性建构	(53)
三 生活世界的内涵	(56)
四 普遍语用学与真理	(61)
第三节 理性生活与政治	(69)
一 对民主制度的重新认识	(70)
二 社会分析框架的转换	(72)
 第二章 商谈伦理——理性生活的道德基础	(79)
第一节 对现代性道德的诊断	(79)
一 对历史和传统的态度	(80)
二 对现代性的理解	(88)
第二节 商谈伦理的体系建构	(97)
一 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认知主义	(97)
二 道德意识的发展及其同一性	(104)
三 道德规范运用的正当性	(109)
 第三章 论证性商谈:民主法治国的建构原则	(113)
第一节 法律体系:作为共同行动的规范	(115)
一 论证性商谈:交往理性与法律的普遍性	(115)
二 强制与自律——法律与道德的区分	(119)
第二节 民主原则与权利体系	(127)

一	民主原则的特点	(128)
二	权利体系的构成	(130)
第三节	政治权力的建构	(132)
一	法律与政治权力的同源性	(132)
二	对代议制和分权原则的重建	(138)
第四节	对个体与集体二元对立的克服和超越	(146)
一	从孤立到共在——主体性的演化史	(146)
二	主体间性结构与交往理性:超越的基础	(148)
第四章	运用性商谈:民主法制国的应用原则	(154)
第一节	法律的应用原则	(155)
一	法律的合法性与运用的正当性	(156)
二	交往理性与运用性商谈	(159)
第二节	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悖论分析	(161)
一	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悖论	(162)
二	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的对立	(169)
第三节	话语民主的建构	(174)
一	民主过程的内涵	(175)
二	公共领域的作用	(178)
三	话语民主的特点	(184)
第五章	全球化与世界政府	(190)
第一节	现代国家与民族的结合	(191)
一	民族观念的演变	(192)
二	民族与国家的结合	(193)
第二节	全球化的冲击和民族主义的批判	(199)
一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	(199)